

中华大智慧

ZHONGHUADAZHIHUI

1

● 圣人 ● 圣书



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读《论语》，读就是六年。1938年10月，在延安特别叮嘱全：“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论 语

● 东方人的『圣经』

白照注译
文对新新
孔子
春秋
注齐齐
小冲
译乎天

中国文联出版社

B2
78

中华大智慧 1

论 语

齐冲天 齐小乎 注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 1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大智慧 / 齐冲天等注释.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5.10

ISBN 7—5059—2340—4

I . 中… II . 齐… III . 哲学思想—经籍—解释—中国—古代 IV .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8069 号

中华大智慧 1

论 语

齐冲天 齐小乎 注释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河南省郑州市中州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3.5 印张 6 插页 1295 千字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300 册

*

ISBN 7—5059—2340—4 / I · 1710 (全三册)定价: 68.00 元

开启东方智慧之门

——《中华大智慧》卷首语

人类又一次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

21 世纪的生存与发展成了全球关注的焦点。早在 1988 年，75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 21 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 2500 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更多的人则预言 21 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华智慧必将而且正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这里所说中华智慧乃指“大智慧”，即儒家文化的核心——儒家伦理道德精神，包涵人性修养、社会伦常和天道自然观。而纵观几千年儒家文化的流变，堪称中华大智慧精华代表的，则是孔子、朱熹、王阳明三大圣人和他们的著作《论语》、《近思录》（含《续近思录》）、《传习录》三大圣书，是谓千秋相续、尊崇不移的圣学心法。孔子被奉作千古至圣、万世师表，成为传统社会的精神偶像，其语录《论语》则作为东方人的圣经。值得注意的是，《论语》所体现的儒学精神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显示了奇迹，被奉为日本工商业界的“圣经”；日本近代工业之父涩泽荣一（1840—1931 年）著《论语加算盘》，提倡道德经济合一论，成为企业家们的必读书；而以“三神器”（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集团主义）为核心、以家族式公司命运共同体为基本模式的日本式经营所贯穿的正是儒家伦理精神。朱熹是新儒学——理学的集大成者，上继儒家绝续千年之道统，是宋代以后八百年间儒学传统的最权威的解释者，不仅为包括朱元璋、康熙在内的历朝

统治者所顶礼膜拜，而且他所集注的《四书》等著作也成了科举的准绳；同时其影响遍及整个东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朱熹的世界观是前现代化时代东方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由他所辑录的《近思录》和清代大儒张伯行辑注的《续近思录》则系统辑录了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的语录，体现了新儒学——理学的全部文化内涵，因而被尊为“六经之阶梯”、“圣学之津梁”，成为近八百年来儒学的入门书，近代大家曾国藩甚至以此为日课，终生研读、力行不辍。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一生武功赫赫，学名昭昭，在朱学衰颓之际，倡导心学，高扬人性，把儒家的内圣之道发展到了极致，至王门后学更带上了明显的近代色彩。其代表作《传习录》更是享誉中外，影响了一代代中、日政治人物和思想家，阳明学在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腾飞期的台湾、韩国都被作为精神的源泉和动力。三大圣人，三大圣书的有机联系和不断完善，构成了儒家伦理道德精神的核心，我们称之为中华大智慧。

不可否认，儒家伦理的某些具体内容或历史形态会随时代发展而被淘汰，但是其基本的精神则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永恒的价值，是中华民族甚至包括东方各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点。如“仁”的个性修养、“人皆可为圣人”的道德自我觉醒、“心即理”和致良知的人文主义倾向；“礼”的社会伦理纲常，充盈着道德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伦理道德实践，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庄严而崇高的理想人格使命；以及内蕴着超越的道德精神境界等等。所有这些既在社会整体层面上和个人生活层面上对现代社会提供了精神的原动力，而且对于平衡和稳定现代化进程中的秩序和规范，和谐人际关系，维系敬业乐群的社会共同体，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华智慧的这种现代价值早已为亚洲四小龙腾飞的历史事实所证明，并且必将在 21 世纪的世界发展中再造辉煌。遗憾的是，沐

浴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对中华大智慧的现代诠释和励行践履还远远不够，从这个角度来重新认识三大圣人、解读三大圣书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我们正是以这样的心情，推出这套《中华大智慧》，愿为世纪之交的人类打开东方智慧的大门。

我们期待着，我们热望着！

自序

本书是满足社会各界中等文化水平的人的阅读需要，故力求明白易晓。对于《论语》这本民族文化中的经书，过了一段时间，离开传统文化远了，人们不免就想再看看它。至于始终喜爱着它的人，那就时而要谈到它。总之，大家是不会忘怀的。

它还有它的魅力所在。

我们许多人经历过批判《论语》和尊崇《论语》两种时代，感受是深切的。《论语》并没有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消失。事实是有些不必存在的东西还存在着，更还有许多应该大加发扬的东西，或应该有批判地继承发扬的东西，则是存在得很不够。这也驱使我们想读读《论语》。它仍然不失是我们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

1、《论语》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论语》就是孔子的论和语，论就是议论，语就是告知，使人有所觉悟。总之，它都不是一般的说话，是学术理论。过去把周秦时的散文，分为记事与记言，《论语》就当然是记言的了。但是其中第十篇《乡党篇》是记载孔子的生活情况和行动风貌，那就是记事的了。

《论语》大多是孔子回答弟子们的提问后所作的记录，有一部分没有问，就是记下孔子的言论，有一部分是回答诸侯国君、卿大夫和各方人士的问题，还有大约十分之一的篇幅是孔

子弟回答别人的言论，如《子张篇第十九》共 25 章就都是子张、子夏、子游、曾子、子贡的话。自来有所谓“语录体”，这便是典型的语录体。没有许多的上下文，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完为止。而且有话也没有长篇大论，即使题目很大，也是大题短论。《论语》中最长的一章该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也不到五百字。最短的是六个字七个字，如“子不语：怪、力、乱、神”，便是七个字。所以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1713—1784）感到孔子学说简洁可爱。孔子作为一个学派的创始人，思想家，世界的文化伟人，总共也就留下了几百段语录，集中的搜集在《论语》里。还有一些散见在《左传》、《礼记》等书中。

《论语》总共二十篇，不到五百章。因为《乡党》等篇中各个版本分章不同，稍有出入，故分为四百几十章不等。但是各章先后的顺序，大家都是一致的。至于最初编纂这本《论语》的人，他把哪一章放在哪里，有没有讲究？小的讲究有，大的讲究看不出来。例如往往有些内容相近的章，编在一起，如孔子遇见隐者的对话共有六章，编在两处，没有更分散，也没全在一起。《子张篇》都是弟子们的言论，但还有一些篇里也夹杂一些弟子的话。为什么要分二十篇，每篇为什么是那么些章，都看不出名堂。每篇的标题取各篇第一章的头两个字，也不成意义。所以，四百多段语录只是很松散地罗列着。而且，还有几章是前后重复的。两千多年来的读者和研究者，谁也没有去编一本归类而有顺序的本子。就是这样一个无体例的体例，各自可以自由地去互相联系，互相发明，在脑子里形成一个学说的整体。宋代的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另外那半部呢，似乎丢掉了也不要紧。不在篇章上下功夫。着重的是去实行，一个字也可以做一辈子，几百章书是“一以贯之”的，所以缺了半部也不要紧。至于《论语》的编录者是谁？当

然是许多弟子们去干的了。要记录几十年里在各个地方说的话，自然要由许多人来完成这项工作。大家记录以后，汇总起来，当年曾在鲁国、齐国等流传着不同的本子。这样，它的编者也就不是出于一人之手。细心的读者发现，书中对孔子的弟子都称字，如子张、子夏等，唯独对曾子，就始终不称子舆，十七次均称其姓，尊称为“曾子”，这就露出了马脚，曾子的学生是《论语》的编纂者或主要编纂人。还有对有若，《论语》中四次称有子，两次称有若，则称有子的地方是有子学生所记。杨伯峻先生说，《论语》中年代最晚的一章书应该是8·4章曾子临死前回答孟敬子的一段话。曾参又是孔子弟子中最年轻的，小孔子46岁，曾子活到70岁，那么记载下这段话，又编进《论语》中去，自然就是曾子的学生在孔子去世四、五十年以后所干的了。

荀卿（前313—前238）无疑是个熟读《论语》的人，他的文章中经常就孔子的观点来作发挥。他的中青年时代离开曾子临死前回答孟敬子那段话的时间，大约是150年，即是离开《论语》成书的时间不远了。我们发现《荀子》的第一篇《劝学》与《论语》的第一篇《学而》相同，都是以学习问题开卷，《荀子》的末篇《尧问》与《论语》的末篇《尧曰》相似，都是以尧的话题收卷，这不像是一个偶合，像是荀子有意安排的一个编纂意趣。若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感到，荀子当时读到的《论语》跟我们现在的《论语》，应该是大体差不多。

《论语》全书一万二千七百多字，过去的人是背得很熟的。由于书中句子短，语气词多，使我们感到在记言的时候，还保留了浓厚的口语风格，只是在后人读来，它已经成了诘屈的古汉语。《论语》的语言，以口语为基础，还需结合许多学术概念、政治用语、史籍词句，还有许多哲理性的语言、文艺性的语言。这样，它就不可能像一般的群众口语，我们也不应

要求一位博学的学者只讲些群众语言。

《论语》一书的主要内容，就是仁义道德。这也就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儒家学派的主导思想。书中从各个角度来论述仁义道德，从个人的思想修养、为人处世到国家社会的治理。它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还有历史上重大事件和人物的评论。他们那时不分学科，不排课程，各人发扬自己所长，因材施教，提出什么问题就讲什么问题。所以《论语》一书的内容是很广泛的。

法国启蒙时代的著名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1694—1774）读了《论语》的二十篇后说：“它们都是讨论善政、道德及美事，此集满载原理及德行之言，胜过于希腊七圣之语。”（《中国君主专制论》第591页。转引自德国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第94页，1991年商务印书馆。）

《论语》担负着一个时代的使命，就是要回答春秋末年我国社会这种混乱分裂的局面（即“天下无道”），如何来改变它（“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到哪里去寻找出路？这也是春秋战国思想学术界百家争鸣的一个中心议题，各自提出自己的方案来。主张在学派那里，大权在诸侯手中，看谁能结合起来，开创时局。

2、孔子学说的由来

我国自周文王、周武王大批分封诸侯，到孔子之时，经历西周而东周，如司马迁所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这五百年以后，变成了个什么样呢？一个主要的事实就是周天子大权旁落，一个显赫的统一的东方大国，变成乱吵吵一锅粥，如16·2章所说：政不再自天子出，而自诸侯出、

自大夫出，甚至陪臣出。我们借用《史记》中武安侯的一句话来描述它，叫做“枝大于本，胫大于股，不折必披”。意即树枝比树干粗，小腿比大腿粗，纯属怪样，不是折断，便是裂开。时代就到了那一步。那么主要毛病还是出于统治阶级上层，出于它们自己内部。这小腿就是春秋五大霸，还有几个小霸，他们轮流坐庄挟天子以令诸侯，政治上争霸权，经济上争土地，强凌弱，大兼小。小腿下面还有小腿，也在膨胀，如鲁国的季氏，齐国的陈氏，晋国的赵氏等等。他们在思想文化上就是荒淫无度，残暴腐朽，礼崩乐坏，道德沦丧。那还是春秋初年的事了，孔子也是知道的：鲁国的惠公看见他儿子的妻子长得好，就“自妻之”，即是把儿媳也占为己有了，还像个人吗，这还是周公的后代哩！《左传》一书中，一切乱伦之事，父子兄弟无情残杀之事，无奇不有。卫国是儿子跟父亲打仗，子路还在中间大起劲。还有春秋时代那些暴君，像晋灵公之流，残忍冷酷，以杀人为儿戏，哪儿还有一点仁爱之心。所有这一切，丑闻迭起，都被孔子一个“讳”字全部抹煞了。要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一切腐败，一笔勾销。

孔子的思想，一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写文章可以讳，研究问题就不能讳。根据这种情况，他认为还是要以仁义道德治天下。这是尧舜、禹汤、文武以来的良好传统。孔子以仁义道德为主旨的儒家学说，诞生在仁义道德严重败坏的时代。

德治是三代以来的传统政治，如《尚书·盘庚》：“施实德于民”，《尚书·泰誓》：“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又如《诗经·相鼠》：“人而无礼，胡不遄（赶快）死？”“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但是《诗经》、《尚书》里没有这种政治的理论，只有一些基本的观点，一项深入而系统的理论建设工作，就落到孔子的肩上了。孔子出身于以周公为始祖的鲁国，那里较多地保存着周朝文化，而孔子也是以周文化的代表人自居，如7·23章所

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文、武之道没有失传，还在人间，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孔子到处都可以学到文武之道。对于孔子个人来说，他生在鲁国国都曲阜，他自幼就是一个好礼的孩子。由此可见，一切条件都具备了，历史给他提供了这个良好的机遇。

孔子并没有留下什么系统的理论大著，如上所述，就是语录数百条。全是口头上所说的，说多了，弟子们记不住，子路的脑子就跟不上，“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又闻。”但是这许多语录总起来看，却还是成体系的。它把仁义道德贯注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各方面，贯注到每个君子思想修养的各方面，如人生观、伦理观、道德观、社会观、审美观等等。诸侯、大夫都做到了，每个君子都做到了，这国和家就都不愁了。

3、孔子的成败

孔子跑了许多诸侯国家，寻求政治主张的实现。35岁（公元前517年）去了齐国，见到了齐景公。37岁返鲁，搭头三年，没有成功。37到55岁（前515—前497年）一直在鲁国，季氏、阳虎那里不愿去，鲁国国君那里不能去，他没有权。但到51岁时，还是作了中都宰，即一个县官，第二年升为小司空，又由小司空升为大司寇，即鲁国最高法官，并代理丞相。干到55岁，干不下去了，是自动弃职的。由55岁到68岁（前497年—前484年），有十四年时间，奔走于卫、宋、陈、蔡、楚等国，也没有成功。眼看就是晚年了，就回到了鲁国，到73岁（前479年）去世。若是从“三十而立”算起，大约四十年，将近一半时间在外，一半时间在鲁。孔子的政治活动无疑是失败的。退而论道，致力于学术和教育工作，

在思想文化上，他大获成功。他成了我国和东亚、东南亚诸国两千年来崇敬的大圣人，当今又成了联合国颁布的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不过孔子的学术工作主要不在书斋里进行，学生侍坐的时候，接待客人的时候，诸侯的朝廷上，赶路的马车上，甚至畏于匡、困于陈蔡的时候，都是他发高论的时候。

孔子的学说对不对呢？

从长远来说是对的。我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发展主要是在儒家学说的推行下取得的，这是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在和平时期，尤其是发展时期，例如汉、唐这两个封建社会的高涨时期，汉武帝宣布“独尊儒术”，唐太宗宣称“酷爱儒学”，那也就是儒家学说的风行时期。宋代和清代，学术思想活跃，也就是儒家学说深入而有进展的时期。当然，什么时候也都会有儒学的对立面存在，只是它不成为主要的方面。

但是在孔子当时的社会，他的学说就行不通。那是一个阶级斗争持久地处于激化状态、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的时代，社会各方面都处于动荡、分化的时代，谁还顾得上讲究温、良、恭、俭、让的道德？有几个人肯接受礼的约束？齐景公、卫灵公和楚昭王，一时都曾想试用孔子这把宝刀。但是，齐景公的耳边，晏婴一打岔，凉风一吹，就拉倒了；卫灵公郊迎孔子，几番一谈，终于话不投机，最后孔子自己走人；楚昭王更是兴师迎孔子，可是令尹（即丞相）子西一席话，主要是说孔子师生要振兴周公、召公的事业，那么楚国不过是子男五十里，能像现在这样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所以王若用孔子，非楚之福也。昭王也就罢休了。表面上看似似乎都是三位诸侯一念之差，实质上是不能接受孔子的主张，即使接受了，也早晚是弄不成。只是在鲁国，已经当了代理丞相，可以一展身手了，何必因为齐国送来一个八十人的女乐，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歌舞团，孔子就自动离任呢？我们原以为孔子未免太脆弱了。你是

代理丞相，你可以想办法绕几个弯，软硬兼施，把那个歌舞团送回齐国，或解散了事。你孔子应该珍惜这个时机啊，你一生追求的不就是这种时机吗！可是再想一想，还是孔子的学说与季氏、鲁定公的思想和政治，背道而驰。孔子看不惯他们，他们也听不进孔子的，迟早是各走各的路。及早一走了事，倒也干脆。而且，人家孔子总是走一步，估计到下一步，留有余地，等到双方翻了脸，甚至动了拳脚，动了干戈，就不好办了。总之，在周代分封制一败涂地的情况下，孔子的学说没人要听。想听的人就是那些已经沦为平民的贵族，他们已经丧失了土地和民众，无能挽回了。

从以上长远和当时两方面来看，孔子的仁义道德，看是对何时、何地、何人、何事来说。它本是周公手中的治国大纲，曾经是开创了一个大时代的，怎么会从根本上就错了呢？例如《论语》的第二章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在宗法社会里，国君对他的儿子来说，既是君臣，也是父子，忠、孝、仁、爱就是一个东西，孔子这句话就一点不错。但是超出这个范围，这章书就有问题了。比如韩非子举了这样的例子：“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北，即“背”，背退）。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五蠹篇》）这里，忠和孝是两个东西，而且抵触起来了。但是还没有犯上，不过是作个逃兵，若是我们看看历来犯上作乱的，孝子也大有人在。例如梁山好汉李逵的孝心就非常可爱，《李逵探母》的戏不是很好看吗。但是他照样要犯上作乱，而且很坚定，人们都喜欢他。

这样说来，《论语》这本书，首先要给国君和他们的继承人看，他们如能接受孔子的教导，邦国的事情就好办了。其次叫大臣们看，叫大夫、士们看，他们作小腿的不要膨胀，也就

没有病了。孔子并没有叫小人也去读《论语》，用不着跟小人去费这许多心力，社会问题主要在上层。然而就在所谓的小人中间，孔子的仁义道德却大大地传播开了，在许多方面形成了民间的习俗，民族的传统，远远超出孔子的意料。

从孔子方面来看，从当时人们对孔子的批评意见来看，孔子对仁义礼乐这一套东西的分析与批判继承的功夫，是欠缺的。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全盘接受的态度。我们很重视齐国贤相晏婴对孔子的批评，说孔子的礼与学，“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即是学不完、讲不清，君臣之礼、丧葬之礼，都是如此。表现在《论语》中，如9.3章，大家把礼节简化了，他不能简，“虽违众”，他也要坚持。他自己也说，“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从孔子又过了五百年，到司马迁写《史记》，在《太史公自序》中评到众家要旨时，太史公也是用晏婴的话批评儒家，说是“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我们讲究礼节，是最需要适可而止的，看情况随时掌握，轻了重了都不合适。孔子是过多地拘于礼了。又如在对待武力的问题上，他也缺乏分析灵活的态度，在那个强权政治的时代，一概不谈力，就很不好办。连文王、武王的暴力也在“不语”之列，对待暴君也不主张起来叛变和杀戮。卫灵公问军旅之事，他就回答俎豆之事，所以就谈不到一起了。比如谈谈仁义之师，诸侯们不是很感兴趣的吗！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句话很精辟，但是中间力、乱二字要具体分析，只有部分的正确性，不能一概不谈。

总上所说，可知《论语》一书的又一特点，便是精华与糟粕杂陈，里面有十分精采的东西，也有很糟糕的东西。主要的，无疑还是前者。

4、《论语》在民族和世界文化中的地位

至少是在东汉，《论语》就被定为我国的经书。西汉时独尊儒术，人们也不会少念《论语》。司马迁没提到《论语》，只是说“余读孔氏书”。当时也没有一个权威的本子，有齐论语、鲁论语，还在孔家墙壁中发现了古本论语，要到东汉郑玄才整理出后人所读的《论语》。不过《史记·张丞相列传》中载汉武帝时有个丞相韦玄成的，说他“少时好读书，明于《诗》、《论语》。”丞相读书不能很少，单举二书，并与《诗经》并列，可见那时《论语》实际上已居于经书的地位。尊儒就必尊《论语》。

两千年来的中国人，读得最熟最广泛的书，就是《论语》了。过去能读书的人总是少数，但是不读书的人也总能听到点《论语》中的道理，或说句《论语》中的话，做点合乎《论语》中仁义道德的事。《论语》中有好些章句已经成为全民语言中流行的口头语。这就是《论语》在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地位。

许多东西，经过孔子一概括，就带有极大的普遍性，成了超阶级、超时代的东西。比如智、仁、勇，有什么不好呢？人们要求智勇双全，难道去追求愚和怯吗？孔子对勇一再向子路作解释，单纯讲勇是很危险的，勇而无礼则为乱。但是人们可以超越孔子的范围，比如我们抗日的义勇军，显然是“见义不为，非勇也”的意思。日本的武士道，也是引这句话，他们的勇和忠于天皇相结合。可见这忠义和勇就超越了时代和阶级，也超越了民族和国家。又如“君子成人之美”，孔子这话是就君子说的，可是我们读起来，用起来就不论了，谁都可以成人之美，何必限于君子？至于俭而不奢，信而不弃，让而不骄，都是大家要讲究的美德。要有道德，有礼貌，人有人格，国有国

格，我们至今还是礼仪之邦。这都是夏、商、周以来又经儒家大力倡导的民族传统。

过去批判儒家，抓它的阶级性，这并不错，他们就是属于那个阶级、那个时代的。但是道德（不论是美德还是恶德）都可以改革、继承和发扬。特殊性和一般性总结合在一起，继承的时候是讲它的一般性，批判的时候是讲它的特殊性。我们讲继承时，不能把批判都看成是错误的，因为你只能继承和发扬优良的东西，而剔除其中丑恶的东西；同样，批判的时候也不能把所有的继承都看成是错误的，因为不能把优良的东西也批判了。这样，在我们民族文化中始终都存在着尊崇孔子和批判孔子两个方面，用不着调和他们，是各个时代发展的需要。不论是尊崇的，还是批判的，都承认孔子是我们中国的大圣人，否则也就值不得批判或继承了。

孔子提倡仁义道德，在我国两千五百年的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思想意识的发展，也和物质的发展那样，存在着力的作用与反作用。仁义道德发展了，仁义道德的对立物也带动起来了。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或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道和魔互为消长。民国年间，有人写了一本书叫《厚黑学》，即厚脸与黑心之学。作者认为二十四史中的英雄名流，无不有点厚黑才能成功。他的书中大量套用《论语》、《孟子》的话，如说：“厚黑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确，现实中的仁义道德之学，总是与魔的掺杂、交量中存在和发展的，远不像理论上、书本上那么单纯而谧静。但又总不致于是一部魔的胜利史，因为仁义道德才符合我们国家和民族存在的需要。批判仁义道德是因为要有新的发展，要让出点地盘，要新旧交替，新老融会。仁义道德的历史遭遇，就不像仁义学说那样温情和睦，逝世以后的孔子，荣辱俱来，也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